



第一章 圣人荀子

一、邯郸赵人

荀子，名况，又称荀卿、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先秦时代，孔子与孟子之后，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

司马迁《史记》称：“荀卿”；刘向《战国策》、《孙卿书录》，班固《汉书·艺文志》，应劭《风俗通义》都称：“孙卿”；韩婴《韩诗外传》称：“孙子”；《荀子》书中多称：“孙卿子”。司马贞、颜师古等学者因避讳汉宣帝刘询，故而改称“荀”为“孙”。顾炎武、谢墉称：“荀”与“孙”，不过是语音之转。胡元仪作《郇卿别传》，将“荀”当作“郇”，荀子是周郇伯的苗裔，而郇伯又是公孙的后代，或以“孙”为氏，故而又称孙卿。这是“荀孙”二姓的三种说法。



荀子

荀子，即荀况，字卿。胡元仪《郇卿别传》云：“昔孟子为卿于齐，荀子亦为卿于齐；虞卿为赵上卿，时人尊之，号曰‘虞卿’；郇卿亦为赵上卿，故人亦卿之而不名也。”游国恩引刘向《叙录》：“兰陵人喜字为卿，盖以法孙卿也”。这是卿字的两种说法。



荀子家乡何处呢？

史料典籍之中，荀子故里亦即出生地在文献中本是一个比较清楚的问题。《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对之有明确的记载：“荀卿，赵人也。”

稍后的班固在其《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所列“《孙卿子》三十三篇”下的注解中亦称：“名况，赵人，为齐稷下祭酒，有《列传》。”这里的《列传》即指司马迁《史记》中的荀卿列传，班固也认同司马迁的历史记载。以后，历朝有关荀子生平的评介，都对荀子为赵人这一点未有任何异议。

《史记》所载荀卿为“赵人”，既可理解为荀卿是赵国之人，亦可理解为荀卿是赵国都城之人。对于《史记》的历史笔法，记载先秦历史人物的出生地，大致有两种记法：一是笼统地记其为某国之人，如：

豫让者，晋人也。

慎到，赵人。

颜回者，鲁人也。

蔡泽，燕人也。

张仪者，魏人也。

孙子武者，齐人也。

伍子胥者，楚人也。

春申君者，楚人也。

吴起者，卫人也。

另一种是具体地记载，为某国某地之人，甚至某地下属的某乡某里之人，如：

犀首者，魏之阴晋人也。

李斯，楚上蔡人也。

晏平仲者，莱之夷维人也。

白起者，郿人也。



王翦者，莱阳东乡人也。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

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

专诸者，吴堂邑人。

后一种历史笔法当是司马迁《史记》更具体地了解其所记之人的籍贯，但前一种记录方法，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司马迁对于所记之人的籍贯只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便以所谓的“某国之人”概而言之。这与司马迁“考其行事，综其终始，欲以究天人之际”的著史精神不相符合。

那么在很多场合之下，约定俗成，第一种笔法正是某国都邑之人的简称。如上所举，“颜回者，鲁人也。”众所周知，颜回乃是居住在鲁国都城曲阜陋巷中的寒士。因而《史记》称他为“鲁人”，便应是指他为鲁国都城之人。又如张仪，文献称他为“魏氏余子”，则张仪当为魏国公族之人，如此他也应当生长在魏国都城里面，《史记》所谓“魏人”，亦理应理解为魏国国都之人。再如伍子胥，《史记》记载其父奢为楚平王太子建之太傅，是其本居住在楚国郢都之内。

在先秦两汉的文献史料中，像这样将某国之国都与某国国名互为借代指称的例子，十分常见。《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吴入郢”，而《春秋公羊传》及《春秋谷梁传》均作：“吴入楚”，是二传均以“楚”当做楚国郢都之称。《战国策·赵策一》有言：“秦之有燕而伐赵，有赵而伐燕；有梁而伐赵，有赵而伐梁。”梁，是魏国的国都大梁，故此在文献中就代指魏国。故此，楚郢互用，魏梁互用，也并不会产生疑惑。

《史记》中这样的例子更多，伍子胥“至楚”，就是指“到达楚国郢都”。荆轲“至燕”，就是指“到达燕国燕下都”。又有“燕太子丹质秦亡归燕”，这里也是指“到达燕国燕下都”。

更为有力的证明就是，“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意思正是，燕太子丹，曾经在赵国做人质，秦王嬴政，也生于赵国。而《史



记》又明确指出：“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那么就可以确定，秦始皇生于赵国都城邯郸，燕太子丹也在赵国都城邯郸做人质。由此可见，赵与邯郸，密不可分，互相指代。

唐代诗人韩翃就有一首诗：“家在赵邯郸，归心辄自欢。晚杯狐腋暖，春雪马毛寒。孟月途中破，轻冰水上残。到时杨柳色，奈向故园看。”其中，赵邯郸，正是这一文化现象的真实写照。

由此看来，《史记》、《汉书》所记载的“荀卿，赵人。”很大程度上是可信的。

赵都邯郸，钟灵毓秀。秦始皇在这里诞生；荀子在这里启蒙。

邯郸是战国时期少有的繁华大都会。荀子之所以能够成为战国末期的伟大思想家，与他出生并且生长在这个大都会有着密切的关系。邯郸不仅经济繁荣，而且人才荟萃。赵国是中华大地上的“中央之国”，邯郸是赵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也是被各国政治家、商人、学者注目和向往的所在。在荀子出生与成长的年代，邯郸正在经历着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不沿旧俗、敢于向旧有的传统意识挑战、吸收学习一切有用的东西为我所用的思想，从幼年时代起就注入了荀子的脑海之中。在荀子的青年时期，邯郸有雄才大略的君王，大智大勇的著名将相，名噪一时的著名学者，诸如：法家慎到，名家公孙龙。这些都成为荀子少年立志，游学列国，学习儒学，批判地吸取百家之长，成就一个伟大思想家的社会平台和生活基础；成为造就荀子敢于面对列国争斗的纷乱现实，不墨守成规，不怕有悖于先哲，为中华大地实现一统，为创建未来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建树理论基础的重要基因。

荀子在启蒙阶段，不论思想、情感、性格、言行都无时不在接受着赵文化独特的人文濡养。特别是荀子启蒙与成长的阶段，正是战国中后期，处于全面鼎盛的赵国正显现出强烈的开放创新的精神气度与开拓进取的恢弘豪情。可以说，崇法尚武、崇礼尚贤、贵和持中、慷慨任侠、刚柔并济、义利



兼容、海纳百川等文化精神，灌注、模塑、铸就了荀子在启蒙时代的文化性格。

荀子的文化性格无疑是复杂多元，兼容并包。然而纵观《荀子》一书，可以看到荀子的人文性格，主要有两个显著特点：

其一，稳健、内敛、务实、严谨的“君子”型文化性格。这无疑是赵文化结构中华夏农耕文明长期教化的结果。故而，荀子的学习观、修身观、道德观无不贯穿着君子的品格，荀子的“君子”之论可以说寄托着他全部的人生追求和政治理想。

生于战国乱世的荀子，目睹的历史场景正是：

道德大废，上下失序。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亲，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

一时间，整个战国舞台上礼崩乐坏，弱肉强食，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七国争雄，纵横捭阖，诸子横议，百家争鸣。战国时代既是纷纭扰攘的乱世，同时也汇集了诸子思想的大成。

为了谋求匡正天下的安定之术，荀子高举“隆礼”的大旗，试图通过“君子”的“正己”与“修身”，施及邦国，以达到天下大治，进而实现“一天下，财万物”的政治理想。

其二，荀子还有激昂、外向、豪放、热情的可谓“侠士”型的文化性格。这种文化性格的养成，自然得益于赵文化中游牧文化的习染，但又不同于单纯的游牧民族那种彪悍威猛、放任不羁的野性，而洋溢着一种热情奔放、慷慨激昂、乐观向上的英雄主义情怀。

面对诸子百家各门各派的争鸣乱象，荀子以惊人的胆略写下《非十二



子》，对当时著名的它嚣、魏牟、陈仲、史鳅、墨翟、宋钐、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等十二人作了学术上的批判。

不仅如此，荀子还以非凡的勇气，面对孟子的性善论，而毅然写下《性恶》篇，提出人性恶，这是他独具特色的思想。荀子主张的人性恶是与孟子主张的人性善相对立的。荀子严格区分人的自然生理之性和人的社会道德之性，认为生理自然之性是天然生成的，是与生俱来的；而社会道德之性则是人为之性，是后天环境教育养成的。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即生理自然之性，性善即后天人为之性，荀子叫做“伪”，即人为，后天的修养。荀子认为人性恶，但又认为后天环境可以改变人性，人经过“化性起伪”即后天的修养，可以变性恶为性善，由此，荀子提出“涂之人可以为禹”。正是在道路上行走的普通人，通过教育与学习，都可以成长为像大禹那样道德高尚的圣人。

不论怎样，荀子颇具“侠士”仗义执言的学术脊梁，以《非十二子》与《性恶》两篇，针砭时弊与警醒人性，其本心在于匡正学术之弊与教化人心之恶。就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荀子》评价都说：“荀子所著的书籍，主张周公孔子之教化，崇尚礼而劝人学，其中最为后人拿来当口实而批判讥讽的，莫过于《非十二子》与《性恶》两篇。平心而论，荀子的学问源于孔子一门，在诸子百家之中最为贴切正统。”这充分肯定了荀子在先秦儒家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诚然，荀子不仅在学术上敢于争鸣，在列国游说的过程中，面对燕王吟敢于直指让位之乱；面对齐国相国，敢于阐发强国之道；面对秦国丞相范雎，敢于预言秦国无儒的后果。面对赵孝成王，敢于论述议兵富强的道理。与那些趋炎附势、毫无政见的碌碌之辈不同的是，荀子敢于面对权贵，直指弊端，毫无讳言，正体现出了他“敢为天下言”的侠士品格。

不论是“君子”品格，还是“侠士”品格，都是少年荀子在赵文化的熏陶下而形成的人文风范。而赵文化“开放、进取、包容”的精神内涵，更





激发了少年荀子以海纳百川的学术胸怀与进取勤学的学术精神，最终成就了集先秦时代诸子百家之大成的思想巨子。

在诸子横议、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荀子首先领悟的，必定是赵国思想的精神濡养。荀子在赵国的十五年中，对其思想影响最大的无疑就是：赵文化的变法图强的历史传统与改革进取的人文精神。

荀子诞生的时代，正是赵武灵王振兴赵国的辉煌时代。

赵武灵王雄才大略，心怀天下，他所领导的胡服骑射改革，引领赵国步入了战国七雄之列而傲立天下。赵武灵王统治初期，赵国还处在齐、燕、秦、魏等国的攻伐之下，中山国成为赵国腹心之国，林胡、楼烦、东胡、匈奴等北方胡人也时常袭扰边疆，使得赵国百姓不得安宁。赵武灵王为了摆脱积贫积弱的时局，“虑世者之变，权甲兵之用，念简、襄之迹，计胡、狄之利。”毅然扬鞭北指，下令全国变胡服，习骑射。胡服骑射，近可以“报中山之怨”，远可以“御秦之边”。从此，赵国的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很快展现了空前的军事威力，赵武灵王御驾亲征，亲提雄兵，率军横扫胡人之地，从而“辟地千里”，雁门、云中、九原等北方战略要地一同归入赵国版图。与此同时，赵国以二十万骑兵连续五年攻打“心腹之患”的中山国，到了赵惠文王三年，中山国亡，从此赵国到代地的路途变得一马平川。《战国策》记载，“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赵独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天下莫能害。”赵武灵王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经过胡服骑射改革开拓了千里北疆，灭亡中山国，一跃而成为战国末期唯一能够与强秦相抗衡的军事大国。

荀子正是在这样恢弘慷慨的赵国舞台上成长起来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变法，对荀子的法家思想的启蒙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孙开泰在《法家史话》中明确指出：许多著名的法家人物，如李悝、吴起、商鞅等，原本就是三晋人，可以说，三晋地区是法家产生的摇篮。

赵国尚法、重法、变法图强、依法治国的历史传统与人文氛围，无疑令少年荀子深受进取精神的鼓舞与法家思想的熏陶。荀子思想的核心为“隆礼



重法”，而将法家思想引入儒家体系，正是荀子深受赵文化开放进取、兼容并包精神有益启发之后的思想创见。其中勇于创新的学术品格与融摄百家的博大胸襟，正是赵文化对于少年荀子的无私馈赠。

赵文化的沃土不仅仅孕育了赵武灵王、秦始皇，而且还孕育并启蒙了荀子。荀子思想是赵文化思想的高峰，乃至中华思想文化的高峰之一。

二、游学于齐

秦始皇在赵都邯郸一共度过了八年的童年时光，而荀子在邯郸至少度过了十五年的少年时光。如果说，八年的光阴，邯郸铸就了一个政治家果敢坚毅的血色品格；那么十五年的岁月，邯郸哺育了一个思想家儒风与侠骨并存的俊秀风范。

少年荀子从小就懂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道理，然而，荀子并没有选择游山玩水，而是提出了“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的游学观点。他说：“学习是没有止境的。靛青是从蓝草中提炼出来的，但比蓝草的颜色更深；冰是由水凝固而成的，但比水更寒冷。不登上高山，不知道天有多高；不亲临深渊，不知道大地有多厚；没有聆听到前代圣王的遗言教诲，就不知道知识的渊博。我曾经整天冥思苦想，却不如片刻学习收获大；我曾经踮起脚向远处观看，却不如登上高处看得更加广阔。所以，君子居住一定要选择好乡里，出游一定要结交贤士，这是为了防微杜渐而接近中正之道。”

宋代诗人赵汝腾曾经盛赞荀子好学之精神：“青出于蓝，冰寒于水。立言劝学，荀卿氏子。卿不如轲，醇乎醇矣。谓学无他，求其放心。存则圣贤，舍则犍禽。差只毫发，隔逾丈寻。”

少年荀子以“学不可以已”的精神，坚定“学无止境”的勤学追求，开始了少年游学之路。而荀子传奇一生的起点，正是赵国邯郸。当荀子走出邯郸东门的那一刻，他已然不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好学少年，而俨然是一位心



怀壮志、初具君子品格与学术思想的俊秀少年。

十五岁的荀子，风华正茂，俊秀才华，从赵国邯郸出发，直至齐国临淄。稷下学宫，正是少年荀子所向往的百家争鸣的学术圣殿。

这里所必须提及的是，两千年来，荀子的思想“羽翼六经，拨乱兴理”，成为历代学者争论的焦点。特别有趣的是，荀子的生平，因为某些历史的原因，同时也成为历代著名史家学者们津津乐道、却又难以详细考证的历史之谜。这本身就是一种奇特而有趣的文化现象。

梁启雄遍览历代荀子研究的史料，仍发出了“难窥其概”的感叹，那么面对荀子一生的种种历史之谜，梁启雄提出了一个可贵的读史智慧：“历代鸿儒之考证亦撷其要而附缀于传征，俾便省览。如是，则荀子毕生事迹传于今者几何秩然赅备！昭然若揭！其牴牾矛盾者，孰可信，孰可疑，读者亦自能审而辨之矣！孔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今本斯悞而自勉焉。”

梁启雄的话十分中肯，他的意思是：历代研究荀子的各位大师与儒家学者们的考证，应当采撷其中的精华要论，附加于荀子的生平之后，以便考察浏览。这样的话，那么荀子一生的事迹传到今天仍然可以找出其中的顺序与脉络，真是昭然若揭。其中有些抵触、矛盾的地方，那些可以确信，那些可以质疑，这些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读者自然可以审视考察而明辨了然。孔子曾经说：“凡事要多听，有怀疑的地方先放在一旁不说，其余有把握的，也要谨慎地说出来，这样就可以少犯错误。”梁启雄的《荀子简释》正是以此为初衷与旨归，与大家共勉。

荀子游学于齐的时间，到底在五十岁的中年，还是在十五岁的少年，在目前没有出土新材料的情况下，尚且不能详考断定，仍然是历史之谜。然而，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荀子游学于齐的目的地——稷下学宫。

当时的历史背景，正是百家争鸣的辉煌时代。

晁福林先生曾这样描述这个时代：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创造出繁荣经济



与文化的辉煌时代，也是一个杰出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学术大师辈出的时代。放眼寰宇，若将春秋战国与同时代的其他地区相比，就更能显示出这个时代的辉煌成就。

从整个世界的发展角度看，当时影响巨大的三大文明中心，首先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然后是印度和古典时代的希腊。这三个文明中间，只有中国是一脉相承发展而来的，而其他两个则是后来所涌现出来的。中国古代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发展中，得到再一次的证明。

杨宽先生提及“百家争鸣”之局与“礼贤下士”之风，曾经说道：从春秋末年起，连同整个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变革时期，这是过去历史学家早已认识到的。王夫之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确实是至理名言。所有贵族重视的礼制，到战国时代都不讲求了，因而出现“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局势。这期间，各国统治者之所以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重大的改革，无非是为了争取广大人民的支持，谋求富国强兵，从而取得兼并战争的不断胜利。于是，各国政府就迫切需要从各方面选拔人才，来进行改革工作。选拔的对象主要就是士。战国时代的士，是当时社会上最活跃的一个阶层。

“士”原是贵族的最低阶层，有一定数量的“食田”，受过“六艺”的教育，能文能武，战时可充当下级军官，平时可做卿大夫的家臣。到春秋后期，上层贵族已腐朽无能，只有士还能保持有传统的六艺知识。到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变革，文化学术相应地发生变革，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士就大为活跃起来。同时各国纷纷谋求改革，推行官僚制度，士的需求急增，于是平民中涌现出一批新的“士”，“士”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通称。

原来，只有贵族才有受教育的权利。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礼、乐、书、数是用来统治的工具，射、御则带有军事训练的性质。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变革，对士的需求增加，教育也发生变化，民间聚徒讲学的风气兴起。书籍收藏和流传的增多，有助于当时学者们



聚徒讲学，开展学术讨论，著书立说。

有作为的国君招徕并敬重所谓贤士，使之为自己效劳；一些大臣也常常向国君推荐人才，以谋富国强兵，因而在战国初期，就出现了布衣卿相之局和“礼贤下士”之风。

当“礼贤下士”与“著书立说”蔚然成风之时，历史条件已臻成熟。文人学士游说的风气也渐渐盛起来。一个很平凡的士，通过游说，一经国君赏识，便可被提拔为执政的大臣。例如卫鞅本是魏相国公叔痤的家臣，入秦后说动了秦孝公，做到了秦的最高官职大良造；张仪本是魏人，入秦后也做到了秦惠王的相；甘茂本是上蔡监门官史举的家臣，入秦后也做了秦武王的左丞相；范雎、蔡泽也都因游说而做到秦昭王的相国。秦国的情况如此，其他国家也差不多。到战国中期以后，各国有权势的大臣每多养士为食客。齐的孟尝君田文、赵的平原君赵胜、魏的信陵君魏无忌、楚的春申君黄歇、秦的文信侯吕不韦所养的食客都达三千人。他们所养的食客中，有各种学派的士，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被罗致，甚至能学鸡叫、扮作狗偷盗的，即所谓“鸡鸣狗盗”之徒也都在食客之列。这些食客，往往为主人出谋划策，或奔走游说，或经办某项事务，也有代替主人著书立说的，例如信陵君因此编成《魏公子兵法》，吕不韦因此编成《吕氏春秋》。食客也有因此被引荐进入仕途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荀子的学生李斯。

于是，诸子百家与“百家争鸣”就成为这一时期的历史奇观。

在战国时代的社会大变革中，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提出了不同的建国方略及其哲学理论，开创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潮，这对于当时的社会变革及文化学术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这时的各派各家之间，相互批判、辩论，而又相互影响；同一学派在发展过程中，也往往发生变化以至于分化。西汉初期的司马谈，曾把所谓“诸子百家”总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汉末年的刘歆，又总括为十家，即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及小说家。十家中除了属于文学



范围内的小说家以外，后人称为“九流”。班固又认为九流十家出于不同的王官（王朝的官府），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道家出于史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小说家出于稗官，杂家出于议官。这一溯源的主张，确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其实，在学术思想上重要的确实只有儒、墨、道、名、法、阴阳六家。

罗根泽在编辑《古史辨》的时候专门把《淮南子》的一段话引为“卷头语”，以此表明诸子百家的源流。

孔子修治成、康的主张，祖述周公的教训，用来教导七十个学生，使他们穿戴起周王朝的衣冠，研究遗留下来的典籍，于是儒学便产生了。

墨子学习儒家的学说，接受孔子的思想，但认为他的礼节烦琐而不简易；丰厚的葬礼，耗费了资财，而使百姓贫困；长久服丧，伤害生命而妨碍政事。因此背离周朝的法规而使用夏朝的法令。因此节省财物，主张简易的葬礼，墨家便产生了。

齐桓公的时候，天子的地位卑下，势力弱小，诸侯用武力互相征伐。南夷北狄，交互侵伐中国，中国没有断绝，但仅像细丝一样，十分危急。齐国之地，东边背靠大海，北面有黄河作阻塞，地盘狭小，田地很少，而百姓多有智术和巧诈，桓公忧虑中国的祸患，苦于夷狄的战乱，想来保存灭亡的国家，继续绝嗣的宗族，使大于的地位尊崇起来，增广文、武的事业，因此管子的著作便产生了。

齐景公在宫廷内贪恋音乐美色，在外爱好走狗、骏马，射箭打猎便忘掉归来，喜欢贤人但是常常不能辨别。建起豪华的路寝之台，聚集铜铁铸起了大钟，在庭下值击之后，引起远郊的野鸡鸣叫。一个朝上便赐给群臣三万斛粮食。梁邱据、子家哙在左右引诱景公。因此晏子的讽谏便产生了。

战国的时候，六国诸侯地域各不相同，大水阻碍，高山隔绝，各自治理自己的境内，守卫着分割的土地，掌握着他们的大权，擅自发布政令，下面



没有诸侯之长，上面没有天子统治。用武力争夺权力，胜利者为尊。他们依仗联合之国，约定能够招致的重兵，剖开符契，连结远方的援兵，用来防守他们的国家，护卫他们的社稷。因此纵横、长短之术便产生了。

申不害，是韩昭王的辅佐。韩国原是由晋分割而建立的。土地贫瘠，而百姓险恶，又介于大国之间。晋国原来的礼仪没有废止，韩国的新法又重新出现；先君的命令没有收回，后君的命令又接着而下。新旧相反，前后相抵触，百官相背而混乱，不知如何使用。因此刑名之学便产生了。

秦国的习俗，贪狠如狼，竭尽武力，缺少大义，而趋向利益。可以用刑法来施行威严，而不可以用教化让他们行善；可以用奖励来勉励他们，而不能用名声来使他们严肃。覆盖险阻而以黄河为带，四周有险关堵塞，地理形势对秦极为有利，积蓄充足。秦孝公想以处于虎、狼之优势，而吞并天下诸侯。因此商鞅的法家思想便产生了。

郭沫若则以颇具文采的语言形容百家争鸣的场景：“自春秋末年以来中国的思想得到一个极大的开放，呈现出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因为奴隶制度解纽了，知识下移，民权上涨，大家正想求得一条新的韧带，以作为新社会的纲领。儒、墨先起，黄老继之，更进而有名、法、纵横、阴阳、兵、农，各执一端，各持一术，欲竞售于世，因而互相斗争，入主出奴，是丹非素。”

郭沫若同时指出，齐国在威、宣两代，还承继着春秋末年养士的风习，曾成为一时学者荟萃的中心，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划时代的意义，它似乎是一种研究院的性质，和一般的庠序学校不同。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可以说，荀子所游学的齐同稷下学宫正是当时百家争鸣的最为激烈精彩的学术殿堂。

孟子说：“仁是人的本心；义是人的大道。放弃了大道不走，失去了本



心而不知道寻求，真是悲哀啊！有的人，鸡狗丢失了倒晓得去找回来，本心失去了却不晓得去寻求。学问之道没有别的什么，不过就是把那失去了的本心找回来罢了。”

荀子则登高一呼：“涂之人可以为禹。”

而荀子针锋相对地提出，人性是恶的，而善则是后天人为的。人自降生时起，就好利、疾恶、好色。放纵这些本性就会带来不良后果。只有师法、礼义才能矫正和约束人性，所以古代的圣人“起礼义、制法度”来化导人的情性。孟子认为：“人之所以要学习，是因为性善。”这是不对的。人的本性是天生的，它不需要学习和修饰，人性饥则欲食，寒则欲暖，劳则欲休。但在礼义的约束下，就能做到节制和辞让。所以，善是后天的、人为的。礼义是圣人制定的，并不是人生来就有的。圣人之所以不同于普通人，就在于他能约束本性，追求性情以外的事物，于是制定出礼义和法度。人们之所以喜欢善，是因为性恶，就像穷人想富有、卑贱想高贵一样。孟子“人性善”的观点是不对的。善，是指正理平治，恶则是偏险悖乱。人如果天性善，那又要圣王和礼义干什么？正因为人性本恶，所以圣人立礼义法度，使人归于善。礼义是圣人制定的，但并非圣人的本性。这就如同瓦器是陶工造的，但不能说瓦器就是陶工的本性一样。如果人性本善，那就不会有夏桀之类的暴君，尧舜也就不可贵了。普通人也可以成为禹。为什么这么说呢？禹能够成为禹，就在于他行仁义法正。如果现在的人都具有明了仁义法正的资质，都具备实现仁义法正的工具，那么他们也是可以成为禹这样的圣人的。

大师之间，如此针锋相对、纵横捭阖的辩论，在先秦诸子之中也是极为罕见，甚为精彩的。其实，孔子很少谈论人性，也只提到“性相近，习相远。”故而，子贡曾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对于《性恶》一文，历代毁誉参半，而以清代谢塘的评价最为中肯：“孟子以性善说，应当是意在劝勉人们为善而发出的劝善之论；荀子以性恶说，应当是痛恨人们为恶而发出的警醒之言。”



仔细思之，荀子主张人性恶，但他对人生而有之的欲望与情感还是肯定的，他所反对的是欲望的无限发展，欲望的失控，性情的放纵，以及由此必然出现的争斗、僭越、暴乱。但荀子的人性论并没有就此止步，否则我们看到的将是一片混乱，而不是理想化的王制社会。荀子在指出人性恶的同时，也给将要陷于困境的人指出了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同样存在于人之中的“伪”是人能主动把握的，它一方面体现在人对外物的影响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对人性的改造上，对人性改造的方法和途径就是礼与法。荀子主张礼义化导在先，法度惩罚在后，这样人性就可以去恶向善，天下就可实现大治。荀子既重视礼又重视法，所以既不同于儒家只强调礼义而显得迂阔而远于事情，又不同于法家只强调法制显得刻薄而寡恩，而是刚柔相济，恩威并用。这在战国时代各家所主张的治国方略中确实是很高明的。

故此，杨倞注解《性恶》说：“当战国时，竞为贪乱，不修仁义，而荀卿明于治道，知其可化，无势位以临之，故激愤而著此论。今以是荀卿论议之语，故亦升在上。”

正如魏晋诗人陶渊明的诗句：“厌闻世上语，结友到临淄。稷下多谈士，指彼决吾疑。”

十五岁的少年荀子，从赵国而来，至齐都稷下而一鸣惊人。荀子以少年朝气，敢于向大师孟子发出学术争鸣，从而留下了人性论辩的千古话题，引发了后代学者的无限深思。不仅如此，风雷激荡的战国局势真是瞬息万变，出人意料。刚刚在学术殿堂与大师孟子争鸣论道的荀子，面对风云变幻的战国时局，又书写了一段少年壮游燕国的传奇历史。

而这段历史的主角，仍然是孟子与荀子。

三、献策幽燕

战国时代，正是时势变幻、英雄辈出的时代。仅就儒家的三位先哲大师



——孔子、孟子、荀子而言，孔子可谓不得时势，周游列国，处处碰壁，孔子时常自嘲：“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有一次，孔子被困匡地，险些饿死，仍不停地弹琴诵诗：“我违忌困窘蔽塞已经很久很久了，可是始终不能免除，这是命运啊。我寻求通达也已经很久很久了，可是始终未能达到，这是时运啊。当尧、舜的时代，天下没有一个困顿潦倒的人，并非因为他们都才智超人；当桀、纣的时代，天下没有一个通达的人，并非因为他们都才智低下。这都是‘时势适然’！在水里活动而不躲避蛟龙的，乃是渔夫的勇敢；在陆上活动而不躲避犀牛老虎的，乃是猎人的勇敢；刀剑交错地横于眼前，看待死亡犹如生还的，乃是壮烈之士的勇敢。懂得困厄潦倒乃是命中注定，知道顺利通达乃是时运造成，面临大难而不畏惧的，这就是圣人的勇敢。仲由啊，你还是安然处之吧！我命中注定要受制啊！”

然而，当孟子与荀子二人，面对时势变化，又会各有怎样的历史表现呢？

在当时，学术上产生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而政治、外交、军事上却产生了合纵、连横的复杂斗争。

各大国纷纷拉拢别国开展激烈的斗争中，外交和军事上就产生了合纵、连横的活动。所谓“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就是许多弱国联合起来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强国的兼并。所谓“连横”，即“事一强以攻众弱”，就是由强国拉拢一些弱国来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这时各大国之间，围绕着怎样争取盟国和对外扩展的策略问题，有纵和横两种不同的主张。所谓纵横家，就是适应这种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他们鼓吹依靠合纵、连横的活动来称霸，或者建成“王业”。他们宣传：“从（纵）成必霸，横成必王。”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苏秦与张仪。他们似乎有英雄造时势的非凡本领。《盐铁论》评价：“苏秦、张仪，智足以强国，勇足以威敌，一怒而诸侯



惧，安居而天下息。万乘之主，莫不屈体卑辞，重币请交，此所谓天下名士也。”

张仪在秦国推行连横策略是获得成功的，达到了对外兼并土地的目的，使得秦惠王能够东“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散六国之从（纵），使之西面事秦”。这是因为他用“外连衡而斗诸侯”的策略，配合了当时秦国耕战政策的推行。

而苏秦、苏代、苏厉兄弟三人，更是“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闻名天下。他们兄弟的游说中心正是在燕、齐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纵横家的缺点是重视依靠外力，不是像法家那样从改革政治、经济和谋求富国强兵入手；还过分夸大计谋策略的作用，把它看作国家强盛的关键。故此，孟子与荀子都对这些扰乱战国时局、随意挑起战争而殃及百姓的所谓纵横家，不以为然。

一日，有人问孟子：“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

孟子回答：“这个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你没有学过礼吗？男子举行加冠礼的时候，父亲给予训导；女子出嫁的时候，母亲给予训导，送她到门口，告诫她说：‘到了你丈夫家里，一定要恭敬。一定要谨慎，不要违背你的丈夫！’以顺从为原则的，是妾妇之道。至于大丈夫，则应该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里，站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上，走着天下最光明的大道。得志的时候，便与老百姓一同前进；不得志的时候，便独自坚持自己的原则。富贵不能使我骄奢淫逸，贫贱不能使我改移节操，威武不能使我屈服意志。这样才叫做大丈夫！”

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反映了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君子精神，与孟子常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互相一致。

而荀子也义正辞严地指出：“内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难，百姓不亲，